

九溪书院:从牟氏私塾到红色小学

台传媒记者陈洪晨/文 徐古忆/摄



探访台州書院文存



扫一扫 看浪潮APP

风雨飘摇的元初,科举制度停废,各地学风日下,台州的文教事业也日渐衰落。元至元年间,翁森在文教受重创的历史洪流中,于仙居乡间创办了安洲书院,“从学者达八百多人”,名噪一时。

彼时,在黄岩西部山区茅畚,牟楷出生了。几十年后,他也在乡间办起了书院,以穿村而过的溪流为名,取名“九溪书院”。

牟楷,字仲裴,初号葛屋,又号九溪居士。他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,其先祖自蜀地迁徙至黄岩后,“世以诗礼闻,由科第而登仕版者累累有焉”。

牟楷的父亲曾是南宋的国子监生,后来因宋元鼎革,拂袖归隐,在家乡的文昌阁开设私塾,启蒙学童,教书育人。牟楷受父亲影响,一心向学,“独刻志于正心诚意之学,贯穿群经,而四书之旨尤为精粹”。

不幸的是,他的父亲英年早逝,母亲又因疾病失明,从此一家人生活得十分清苦。牟楷以孝顺闻名乡里,虽然满腹经纶,却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不肯入仕,“以菽水莫继,晨夕不能去左右”;也有一种说法,是他遵父训,“誓不仕元”。

也许是为了生计,也许是为了教化乡里,他也学着父亲开馆授学,于是有了九溪书院。

虽地处偏乡,九溪书院所在的茅畚下街也是块风水宝地——背倚柏嘉山(又称鸣山),山上有三峰耸峙,山下有九溪潺潺,望之宛如龙凤。九溪(又名茅畚溪)有两大源头,分别是山卡岭和平田岭,经北洋汇入永宁江。柏嘉山和凉凉溪流汇合而成的九溪,山水相依,钟灵毓秀。

九溪书院创办的具体年份,史料记载缺失,从牟楷生活的年代推测,大致为元代中期;至于建筑规模,《黄岩牟氏宗谱》载“向西五楹”;从办学成果来看,牟楷“授生徒至数百人”,虽生活清贫,却乐于劝勉和扶持贫苦子弟入学,“姻族弟子贫不能致束脩者,皆诱掖奖劝,以成其业”。

仁宗延祐二年(1315),元朝廷开科取士,仿照南宋建立科举制度。

牟楷虽然自己不求仕进,却支持了学生和家族子弟走科举之路。听闻族人读书有了出息,他欣喜不已,病中还亲自作文勉励,“乾坤再造,故家乔木之凋替,莫吾族为甚。然诗书一脉,尤幸仅延而未熄也!”(《送堂弟子禹、子南赴序序》)牟楷在易学和理学上有着极深的造诣,“平时所为文章,凡以性命为先,词华为后”。

到了晚年,他仍手不释卷,一生著述颇富,

有《九经辨疑》《河图洛书议》《春秋建正辨》《深衣刊误》《定武城错简》《管仲子纠辨》《致中和议》《桐叶封弟辨》《四书疑议》等。他的文章,多为对古文经义的理解与注释,也有部分文章对古文献提出疑问或刊误。

元至正二十一年(1361),牟楷“年八十而卒”。因其著述“不勦袭旧说,自成一言”,门人名其书为《理窟》,并尊牟楷为“静正先生”(《黄岩牟氏宗谱》作“靖正先生”),九溪书院因此又被称为静正书院。

《万历黄岩县志》卷之五《人物志》将牟楷归于“儒林”一门,生平记述不过百余字。

所幸,同样归于“儒林”的元代另一位黄岩乡贤陈德永(曾任和靖书院院长,历官江浙儒学提举),曾作《九溪先生传》,让我们看到了个性更为鲜明的牟楷:“为人不阿世、不矫俗,居常必衣冠以对经史,必束带以见子侄。虽毅然独立,未尝欲侧侧仰。春秋祭祀,深衣幅巾以严裸荐,不以微薄废礼焉。若贵游斗鸡走狗博塞嬉戏,不敢过其门。凶悍见之,茶然沮丧;邻里沾化,揖让可观。”

从陈德永生动的记述中,可知牟楷持身严肃,十分重视礼仪。即便未曾九溪书院上过学的乡民,观其言谈举止,亦可受到教化。

与翁森去世后便停止办学的安洲书院不同,九溪书院在一代代牟氏族人的接续努力下,尽管磕磕绊绊,却一直延续下来,元明间为黄岩乡间知名的书院之一。

据《万历黄岩县志》,明正德年间,九溪书院一度倾圮,直至明嘉靖三十五年(1556),汪汝达重建书院。

汪汝达是无锡人,嘉靖三十二年(1553)以进士出身担任黄岩知县。他到任时,黄岩因倭寇之患,邑里几乎成为废墟。除了修缮城堞,恢复民生,这位汪知县十分重视教育,“建先师庙,改淫祠以祀朱子,置学田以贍贫生,一时兴废坠举皆有裨于政教之大者”。

明嘉靖三十六年(1557),牟氏族人牟堪(官至建康府宣课司大使)举荐牟楷入祀乡贤祠:“所为文章,典瞻古雅,乡邦传诵……原有九溪书院,遗泽尚存……堪入乡贤祠,以励风化。”

于是,汪汝达率师生致祭,并亲作《牟楷先生奉主祠乡贤祠祭文》:“山川毓秀,性质高明,



九溪书院自元代草创以来,传承有序,发展至当今的茅畚逸夫小学。



得濂洛之正传,学称理窟;全忠孝之大节,行播儒林。正养静修,不求闻达;述经著史,罔事纷华。实潜德之幽光,切秉彝之同好。达等承乏兹土,咨贤仰哲,山斗系思。会宗师之微文,成輿情之义举,占吉启告,奉主祠祠,永列官墙,同荣祀典。神其不昧,尚其格思!”

清乾隆十一年(1746),牟氏族人集资鸠工,重建九溪书院。

同治十一年(1872),黄岩知县孙意改九溪书院为启秀书院,并扩大了规模,左右各添横楼三间,向南阁上祀文昌帝君,所以南阁又称文昌阁。原有公田六十亩,租一百廿四石,孙意又加拨称歌田租五十石。牟氏族人牟攀曾作《靖正(静正)书院膏火记》详述此事。

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清政府颁布《钦定学堂章程》,诏令各省、府、县分别设立大、中、小学堂。此后,各地书院大多改为初、高各等学堂,书院体制宣告落幕。

其间,九溪书院又曾圯圮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,当地绅士牟肫生、牟月轩等出资整修校舍,整顿校务,并改书院为励志学堂,但因经费困难,多次停办。

1926年,励志学堂改为励志小学。几年后,改称黄岩第六区茅畚小学。1937年,校董会牟正非、牟子然、牟雄洲等再次筹集经费,重修校舍。1940年,因学生人数增加,修理大夫庙及斗姆宫为预备校舍。同年八月,改称茅畚乡中心小学。1945年夏,更名为茅畚镇中心小学,此间学生两百多人,分五个年级段。1949年后更名为县立茅畚小学,1953年改称茅畚乡中心小学。

抗日战争时期,中共黄岩县委机关曾设于学校内,这让茅畚小学有了“山乡小红校”的美誉。

1934年秋,林泗斋担任茅畚小学校长。他是中共黄岩县第一个党支部的支部书记,黄岩县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。

林泗斋到任后,聘请了陈庭槐、陈叔亮、金匡鉴、王纯甫等进步教师来校任教。陈叔亮在校门两侧题写的20个美术字“劳动的身手,科学的头脑,创造的精神,艺术的兴趣”,至今犹存;王纯甫在四合院天井内栽种的两株木樨,也已长大。

在茅畚小学,林泗斋率领进步教师,一面开展革命活动,一面进行教育改革。

学校奉行陶行知先生“生活即教育,社会即学校”的教育主张,实行“做、学、教合一”。除自编教材、改进课堂教学外,还设立“小法庭”,开设“小邮局”,开辟小农场、小工场、小饲养场、小印刷厂;学生组织“学生会”,自办图书馆,自编



抗战时期中共黄岩县委机关旧址纪念馆,就设在茅畚逸夫小学内。

见微知著

关于九溪书院,光绪《黄岩县志》和民国《台州府志》的记载一模一样,都非常简短:“在茅畚,元牟楷讲学于此,后人祀之,明正德间圮,嘉靖丙辰(1556)汪令汝达重建。”所幸者,《黄岩牟氏宗谱》保留了较详细的材料。

九溪书院的创建者牟楷,方志中的《传》也极为简略,记述比较全面的,大概就是与之同时的陈德永所撰之《九溪先生传》了。这些在陈洪晨的文章中都已反映得淋漓尽致,无需拙笔再加饶舌。只是有一点,《宗谱》的材料中称牟楷门人尊其为“靖正先生”,书院也曾被称为“靖正书院”,牟氏后人牟攀还写有一篇《靖正书院膏火记》等,恐怕并不正确。据明谢铎的《赤城新志》、民国《台州府志》、万历《黄岩县志》、同治《黄岩县志》、

光绪《黄岩县志》及臧学标的《三台诗录》小传,俱称牟楷门人“尊之曰静正先生”;晚清王菜所辑之《台学统》“牟楷”条,题目也叫“静正牟仲裴先生楷”;还有明黄岩知县汪汝达所作之《牟楷先生奉主祠乡贤祠祭文》所述“正养静修,不求闻达”云云,亦可证牟楷门人对乃师的尊称必为“静正”。

牟楷生平精力基本都倾注在学术上,偶尔也会觅句赋诗,现今流传下来的有两首,一为古风体《悼陈氏兄弟》,一为七律《秋日书怀》。《秋日书怀》则显然是其内心的感怀与写照:“画虎屠龙技莫高,日长周蝶且陶陶。支吾风月吟千首,埋没林泉见二毛。世路未语休强出,生涯随分勿徒劳。秋声昨夜来庭树,独对青灯课楚骚。”

在台州的历史上,

黄岩的办学之风最盛,黄岩的书院、义塾、私塾数量也最多。据民国《台州府志·学校略》所载,黄岩直接书院名录为24所(包括今路桥),太平(今温岭)、宁海(含今三门)各16所,临海11所,仙居8所,天台仅间接名录5所。

在黄岩(含今路桥)的24所书院中,我们已介绍过樊川、石龙、柔川、东甌(今属椒江)、九峰、翼文、灵石、清猷8所书院以及见于间接名录的扶雅书院,还有祀范、金清、南梁、西华、原道、秀川、文献、紫阳、回浦、南峰、文毅、灵峰、育才、鸣山、峰山、於氏等16所书院,其中有不少在当时的影响未必小于九溪书院。我们这次之所以

将九溪书院作为黄岩的重点书院之一来介绍,一是因为九溪书院自元代牟楷草创以



徐古忆

来,直至今日的茅畚逸夫小学,始终传承有序,脉络清晰;二是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,茅畚小学是台州最有代表性的一所红色学校。它不仅是抗战时期黄岩的革命中心,更是黄岩乃至台州孕育和培养革命青年的最重要基地。他们的红色烙印和革命精神,必将永续长留在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前进的步伐中。

